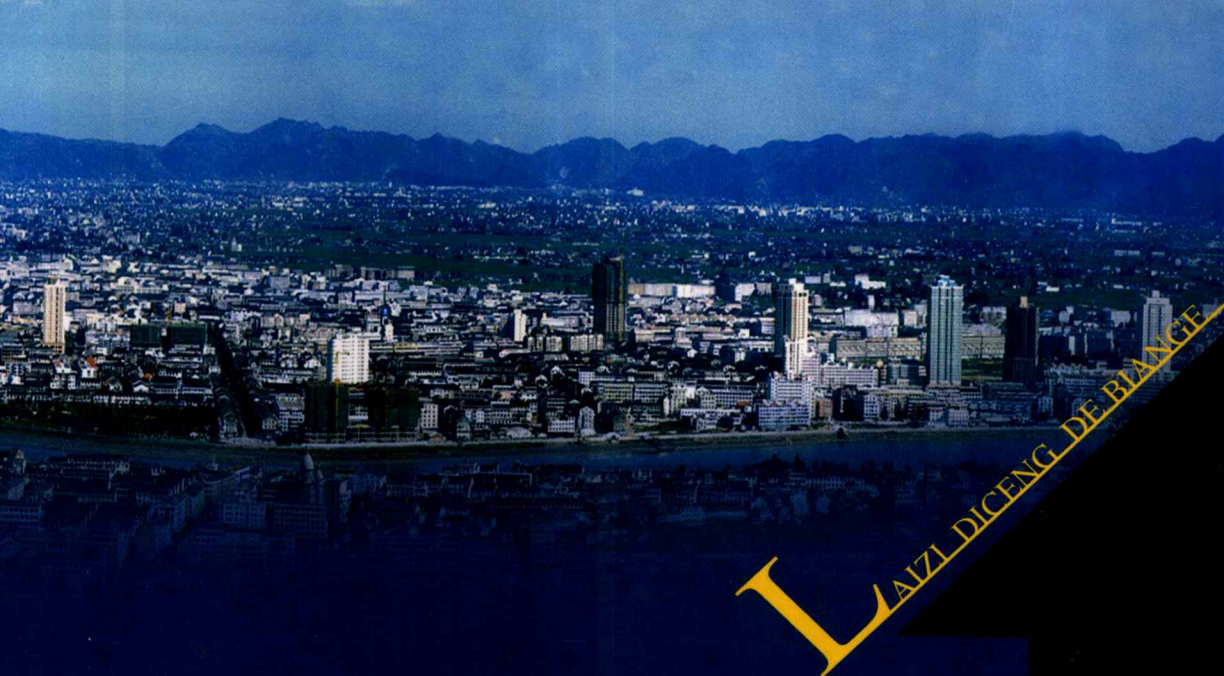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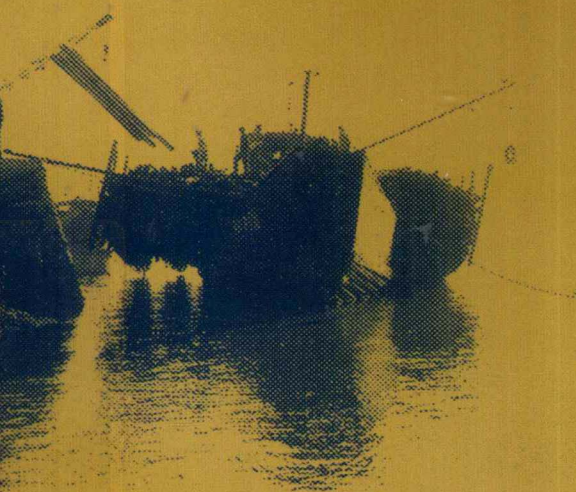




来自底层的变革

——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

◎ 朱康对 著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来自底层的变革

——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

邱继祥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来自底层的变革

—— 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

LAIZI DICENG DE BIANGE

◎ 朱康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底层的变革：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朱康对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13-02676-3

I. 来… II. 朱… III. 城市化—研究—龙港镇
IV. F299.2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2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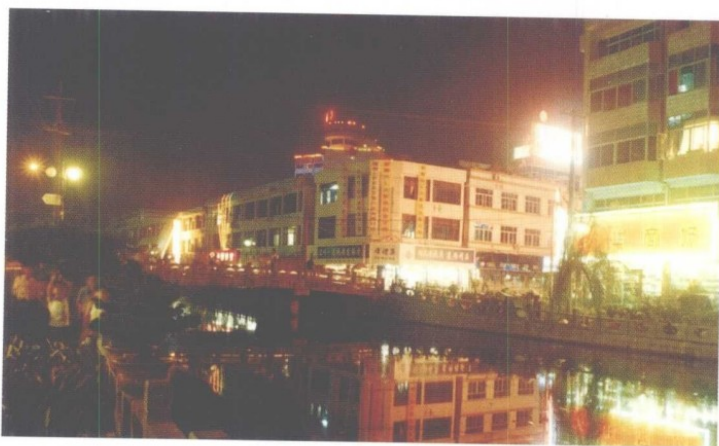
来自底层的变革 ——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

朱康对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蔡颖春
封面设计 顾 页
责任校对 李育智 朱晓阳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拱康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8 万 插 页 4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676-3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龙港龙翔广场



龙港夜景



龙港外滩

序 —

大约在1999年的暑假前后,浙江省委党校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全省党校系统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评奖活动,邀请我担任评奖委员会评审专家。评奖过程中,读到一篇题为《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群落演进——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初探》的论文,眼睛一亮,极力推荐。由于匿名审稿,事后遂向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张静蓉博士打听论文的作者,得知作者是温州市委党校的一位青年学者朱康对副教授。当时,我正在主持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温州模式”研究》,急欲得到温州本地学者的帮助,于是,我和朱康对很快就取得了联系。

2001年5月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立了一批以案例研究为主的有关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规划研究课题,省规划办曾骅主任邀请我担任研究课题招标的评审专家。评审中,专家们一致投票通过了朱康对主持设计的有关温州龙港农民城的案例研究课题。随后,朱康对来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以国内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合作研究工作。在浙江大学期间,除了龙港农民城这一课题外,他还在我主持的《经济学文献选读》研讨班中,运用美国经济学家加里·D.利贝卡普的《产权的缔约分析》一书中的产权经济理论及分析方法,结合他亲自深入实际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完成关于温州市永嘉县楠溪江全流域承包的案例研究。有关研究成果的初稿曾在—场中英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引起与会中外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响。记得有一位英方教授建议将这一案例研究收入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康对学弟是一位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青年学者,具有比较扎实的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理论的功底,同时,对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有很好的钻研。近年来,在研究中,他又阅读了大量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产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使得自身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和合理,为准确地发现和提出问题、系统深入地研究问题,打

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点在书中可以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

康对学弟也是一位严肃认真和肯吃苦的年轻学者，他在研究中的刻苦钻研精神是大家公认的。也许是由于对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偏爱，也许是由于他对探索“真实世界”的强烈欲望，他在研究中不辞辛苦，经常深入到“真实世界”中进行“田野作业”，找到亲身经历各种故事的“真实的家伙们”作访谈，力图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展开研究。康对的研究风格是重实证、重归纳，没有过多的理论演绎。这一点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说完好话，也兼带几句“坏话”。

《来自底层的变革——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一书总体上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但是，坦率地说，这部著作仍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产业集聚与社会变迁这条主线似乎不足以将所有的研究内容非常有机地整合起来，从产业的兴起和集聚到城镇的产生与扩张，再到社会的转型与变革，这三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仍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二是典型材料的深入剖析也似乎给人还不过瘾的感觉，老实说，在读《黄河边的中国》时，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深究的力度不太够，在材料与结论之间的理论和逻辑的“桥梁”不够完善，因此，经济研究的深度也有待于加强。当然，这两句“坏话”，一方面可能是本人对康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期望过高的缘故；另一方面完全可能是一位经济学家由于中主流经济学“流毒”过深所导致的学科“偏见”。过高也好，偏见也罢，丝毫不会影响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作者和众位读者大可不必理会。

根据现行的科学研究管理体制，一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出来后，必须经过专家评审合格方能结题。本人有幸又被曾骅主任指定为评审专家，同时康对学弟又诚邀本人写序。于是，脑中闪出一个“机会主义”念头，何不以“序”的形式写一篇研究课题的评审意见，一举两得，完全符合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晋川

2003年4月30日抗“非典”时期于杭州

序 二

1985年3月,我在温州作经济调研时,首次踏上了龙港的土地。那时,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批祖祖辈辈生活劳动在龙港周边地区、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浪潮先富起来的农民,怀着做“城里人”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龙港,自筹资金、自己造房、自理口粮、自谋职业、自求发展。到处是零乱而忙碌的建筑工地,龙港充满着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农民造城运动”还刚刚拉开帷幕。后来,我有幸多次到龙港调研,每一次都能看到龙港在充沛的活力、巨大的能量和农民的智慧推动下,所发生的从规模到形象、从外观到气质的惊人变化,让我感到激动振奋,欢欣鼓舞。我在《依靠民间和市场力量推动的城镇经:温州的经验》这篇小作中,也曾侧重介绍龙港的成功经验和变化,并把它视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一条独特道路。

大约在两年前,在讨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个案研究规划课题时,我曾建议应把温州市龙港镇作为民间推动型城市化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立题研究。凭着对温州市委党校青年学者朱康对的了解,我认为他是承担该课题的合适人选,故建议将这个课题交给康对。现在,当我收到他著的20多万字的课题研究成果时,又不免产生一种先睹为快、急切而又关心的心情:龙港这个个案本身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关于它的研究成果又怎么样呢?

应该说,该课题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自温州模式出名后,龙港也跟着家喻户晓。研究龙港经验的论著已经数不胜数,要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何况,社会经济的“个案研究”不光是要如实讲述某个已经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还要见微知著,揭示故事本身的丰富内涵、变化的历史逻辑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个案研究”的难处在于要做到“一滴水中见太阳”,即让个案这“一滴水”能够折射出“太阳”所具有的五光十色的斑斓世界,它不仅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

究,还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揭示它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和内涵内容性。小处着眼,小题大做,是为了成就一篇大文章。从这个角度看,“个案研究”也是对研究者毅力、学力的一种考验。该书作者在多年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基础上,通过一年半的艰苦写作,终于成就了这一成果。可以想见他为此付出的大量的劳动和心血。在学风浮躁的当今时代,这种严谨治学、孜孜以求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龙港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这是本书作者由衷的感叹。我感到,该书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所揭示出来的深刻意义也是对得起这个精彩故事和故事中的主人的。它结合我国城市化战略演变、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综合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的方法,不仅分析了龙港城市化的背景、道路、演变过程和经验启示,阐述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还考察研究了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文化转型及市民社会形成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温州模式研究的空白。

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该书。相信每一位关心中国农村变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读者,都可以从来自底层、来自民间的龙港城市化变革经验、丰富内涵及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是为序。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张仁寿

2003年9月5日于杭州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龙港农民城兴建的背景 / 10

第一节 城乡分隔体制的突破与农村城市化 / 11

第二节 温州模式与温州的区域文化特征 / 14

第三节 龙港的区位条件和区域特征 / 23

第二章 龙港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 37

第一节 龙江港区建设:城市化的前奏 / 38

第二节 龙港建镇:外延城市化发展阶段 / 44

第三节 城市化转型:内涵城市化发展阶段 / 55

第三章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 60

第一节 城市化与产业集聚 / 61

第二节 城市化与群落内部的组织成长 / 69

第三节 城市化与产业群落空间布局 / 77

第四章 城市化与社会变迁 / 84

第一节 城市化中的社会变迁 / 85

第二节 城市化过程的结构分化 / 91

第三节 城市化过程的社会整合 / 105

第四节 城市化进程中分化与整合的不连续性 / 111

第五章 城市化与文化转型 / 119

第一节 城市化与建筑文化变迁 / 120

第二节 城市化与制度文化转型 / 128

第三节 城市化与生活方式转变 / 133

第四节 城市化与龙港人的精神特征 / 141

第六章 城市化与市民社会成长 / 158

第一节 温州模式与市民社会 / 159

第二节 民间推动型城市化与市民社会基础 / 164

第三节 第三部门:社会角色与公共职能 / 172

第四节 城市化与市民社会成长 / 179

第七章 制度创新与城市发展 / 186

第一节 城市发展与行政制约 / 186

第二节 龙港建市的方案及障碍 / 194

第三节 龙港经验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 203

龙港大事记 / 215

后 记 / 235

导 言

十几年前,在温州鳌江下游南岸,有一个小渡口,当地人把它叫作方岩下码道。距这里一公里处还有一个下埠渡口。江对面就是平阳县鳌江镇。鳌江以南一带农民要外出,都是从这里过渡到鳌江,再乘车前往温州和全国各地。由于位于渡口,方岩下逐渐形成了一条小街。不过,尽管这里人群川流不息,但多是匆匆过客。当地曾流传一个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虽然这里早在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就建成了渡口,民国初年开始沿街零星开设店铺,但长期以来一直人口稀少,市面萧条,周围几个村庄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只有6000多人口。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平阳县分设平阳、苍南两县。1983年10月12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龙港镇,隶属苍南县。1984年6月,龙港镇正式开始筹建。短短的十几年以后,这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龙港镇街道纵横,高楼林立,总面积80.7平方公里,总人口23万,建成区面积10多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12万,下辖9个办事处、23个居民区、107个行政村。200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外贸出口供货值3.32亿元,财政收入2.7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漫步街头,眼前的繁华景象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当年的样子。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兴建的城市——龙港。

—

如果从行政建制上讲,龙港还只是一个镇。因此,大多作者在研究龙港城市化问题时,都使用城镇化的概念。在此,我们准备直接用“城”、“城市”和“城市化”等概念来研究龙港问题。所以,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城”、“城市”和“城市化”等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

在中国古代,“城”和“市”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分为两重,里面的称为城,外面的称为郭。《古今注》中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市,是集中交易的场所。《说文解字》有:“市,买卖所也。”《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起初,市没有固定的场所。自从城郭出现以后,由于这里人口集中,慢慢地交易活动也集中到这里。不过,“市”一般在平民居住的“郭”中。从此以后,城和市逐渐融为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步退化,城市的军事职能也逐步弱化,相反城市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却日趋强化,现代的城市就渐渐成为与农村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那些人口集中稠密,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的地理区域。^①国外经济学家定义“城市”概念时也基本类似,它是指具有相当面积,经济活动和住户集中,以致在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产生规模经济的连片地理区域^②。

“城市”与“市”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地理概念,除了上述定义所述的特点外,它没有法定的分界线,具有边界模糊性。按照美国联邦政府规定,一个(或两个)有5万人以上的居民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聚居地区都可以作为一个城市化地区。城市化地区可以被看作典型的城市,而不管其行政区划^③。而“市”则是属于与省、县等行政建制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法律概念,它是依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条件,按照法定程序设置的地方行政建制,设有相应的国家政权机关,有明确的边界和确定的管理范围。城市和市尽管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联系,一旦城市按照市的建制设置,就成为建制市。由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转化为有行政建制的市的过程称为“设市”,它往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依据,并需要通过严格的行政法程序。龙港尽管从行政建制上看还没有设市,目前只是一个建制镇,但是从其建成区12万人口的集聚程度以及其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力来看,它早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于把龙港称为“小城镇”,但是我国的城市经济学者早就指出,“小城镇属于城市的范畴,小城镇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及其所负担和赡养的居民,不论从户籍上是

① 刘君德、汪宇明:《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页。

② [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③ 同②,第25页。

否属于城市居民,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都是城市人口。”^①因此,本书采用“城市”一词来描述龙港,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和地理意义上,而不是从政治、法律意义上。

同样,在描述龙港社会转型时,我们直接采用“城市化”的规范概念而不是“城镇化”的概念,也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城市化是指从以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城市经济的特征是密度大,商品和服务生产专业化,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以及每种群体内部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性,以及高水平的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等等。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尽管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趋势趋缓,有的还出现了人口向城郊转移的趋势,但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交通和通信条件改善以后的结果。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集中化的城市社会拥有分散化的农村社会所无可比拟的经济、社会、文化优势,城市化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战略,加上龙港目前在行政建制上还是一个建制镇,因此许多学者往往谨慎地使用“城镇化”的概念。不过,笔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讲,正如前面所述,使用“城市化”的概念来描述龙港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完全没有问题;即使从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讲,我们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趋势,使用这一概念也是符合逻辑的。

不过,由于存在行政建制管辖范围和实际人口聚居区的差异,加上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后,龙港镇的行政区划不断扩大,所以我们在研究龙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时,经常会碰到两者在实际数据上的差异和矛盾。比如,由于龙港管辖范围扩大,周围的湖前等并入后,全镇的总人口增加了,但城市化率指标却降低了。因此,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地对建成区和全镇,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区与周围农村进行区分。

^① 杨重光、刘维新编著:《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二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教授就曾经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对于拥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庞大的农村人口就业压力使得这一命题至今仍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我国曾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城市的模式。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最普遍的模式。一种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依靠集体经济,由政府推动和动员,投资建设小城镇的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依靠民间力量,运用市场机制,推进城市化的“温州模式”。龙港就是温州模式城市化的典型代表。

史晋川教授认为,所谓“温州模式”是指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因此,温州模式的意义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作为制度变迁模式。温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点是,温州人利用其善于捕捉经商机遇的优势,迅速地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很快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起步于家庭工业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同时专业市场的创建与发展,又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与迅速扩张。^①

张仁寿(1999)认为龙港的城市化经验就是依靠民间力量、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引导推进的城镇化道路。他认为,以龙港为代表的温州城镇化道路的主要特色是:民营经济奠定了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基础,市场导向激活了小城镇发展的内在活力,农民群众构成了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力量,社会分工形成了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优势。龙港的城市化道路是浙江广大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许多农村都逐步走向了城市化的道路。^②不

^① 参见史晋川、朱康对:《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仁寿:《依靠民间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城镇化:温州的经验》,载《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期。

仅温州的永中镇、柳市镇等有着类似的过程,而且绍兴的柯桥、台州的路桥等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尽管它们起点不同,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化特点还是类似。因此,系统总结龙港的经验对于研究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记录农村城市化的历史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龙港城市化道路是一条民间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通过对龙港的研究,可以总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运用市场手段来进行城市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广东的深圳,一个是浙江的龙港。深圳是我国特殊时期国家出于长远的统一和改革试点的目的,集中投资兴建的一座新兴城市;而龙港则完全是由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一个小城镇。国家集中投资兴建的深圳曾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而闻名;而农民集资兴建的龙港的建设速度却比深圳还要快。尽管两者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不可能拿出像投资深圳那样的资金来投资其他各地,因此龙港这种民间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对全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讲更有普适性和长远性的意义。

2. 龙港城市化过程是从农村起步并逐步演化的,因此通过对龙港的研究,可以系统观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文化转型。龙港镇的前身是几个小渔村,尽管由于处于渡口位置,曾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但尚未形成集镇的规模。然而龙港建设开始后,由于对这里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周围三省七县的农民蜂拥而至,因而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龙港就从几个渔村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城镇。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龙港农民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当地的社会文化也出现了逐步向城市转型的趋向。因此,龙港农民城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系统考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3. 龙港农民城是农民集资兴建的,其市民大多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以及其他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社会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民企业家。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构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基础。龙港镇各种非赢利性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而且市民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自治愿望。可以说,通过对龙港的观察,我们可以研究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艾伦·刘(1993)曾经指出,温州这些新企业家、小公司和小城镇可能大大有助于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从而导致产生强调社会经济发展而轻视政治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温州人所代表的新民族主义类似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民族主义。同时他还指出,温州模式如果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和运用,它迟早也会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和体制理性化。因此,温州模式的意义不仅仅是“小商品、大市场”,它还有“小

自主、大民主”的深远影响。^①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我们不完全赞同,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按其所预期的方式自发演化,但是至少龙港的发展从某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4. 龙港城市化是民间推动型的,同时又是政府积极组织的,因此通过对龙港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变化的研究,可以认真总结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思路的影响,我国政府在城市建设问题上采取的是由国家统包一切的方法,其结果是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最后又不得不控制城市的规模,限制农民进城。这种政策的现实后果是不仅拉大了城乡差距,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在对待农民进城问题上形成了歧视性的做法;而且由于政府负担过重,还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和城市化的滞后,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是转型期急需研究深入研究的课题。龙港农民城的兴建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政府组织,利用民间力量,采用市场手段,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的重要案例。

三

龙港镇的特殊意义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建镇以来前来考察研究的人络绎不绝,专门研究和总结龙港城市化经验的文章和书籍也数量不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91年李浩然的《龙港发展模式——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新探》曾对龙港的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它是当时系统研究龙港问题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该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龙港的诞生,第二部分进行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第三部分是龙港农村城镇化探索,第四部分是建港方略。1992年陆立军教授和李其铁负责的浙江省软科学重点课题《温州市龙港镇发展战略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促成龙港发展的主要动因和机制有五个方面——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宽松是龙港发展的基本前提;区位优势是龙港发展的客观基础;非农产业的发展为龙港镇及其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积累和一定的条件;制度创新为龙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不完善的宏观市场体系为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必

^① [美]艾伦·刘著,张敏杰译:《“温州模式”的利弊》,载《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214—229页。